

# 书籍史和启蒙运动研究的往昔与未来

——美国文化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访谈录\*

张弛 成沅一

---

【编者按】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哲学学会院士、哈佛大学“卡尔·福兹海墨大学教授”、<sup>①</sup>哈佛大学前任图书馆馆长。他的代表作《启蒙运动的生意》《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等,都已有中译本问世。2019年10月,达恩顿教授应浙江大学法国史研究中心邀请赴浙大交流访问。在此期间,张弛和成沅一对他进行了采访。在访谈中,达恩顿介绍了他走向书籍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并分享了他对书籍史及其扩展领域阅读史和交流史的看法,对前述领域涉及的集体意识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的理理解,以及对数字化、全球化时代中启蒙史学方向变迁的理解。

---

问:达恩顿教授,您能接受本次采访,令我们倍感荣幸。本次访问浙江大学期间,您的演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您的大部分作品已经翻译成中文,其中《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sup>②</sup>通过《新史学:自白与对话》,<sup>③</sup>中国读者对您的个人经历已不陌生。所以,我想以另一个问题开始我们的访谈:作为美国人,您为什么选择18世纪法国史作为研究领域?

答:首先,我很感谢你们提供了机会,让我能直接对中国读者发表演讲。最近访问浙江大学期间,我受到了热情的款待。我发现,我的东道主们的西方历史知识相当丰富;同时,我也意识到,东方还有许多有待我了解的东西。我希望这次对话至少能为地球两端的我们的交流作出一点贡献。

其实,我不是一开始就选择研究18世纪的。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我选择的是美国史和美国文学。1960年毕业后我得到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四年后完成了博士研究。我的导师是法国革命史学家理查德·科布。但是,他没怎么指导我,就是让我去档案馆,回来做研究,不过这倒是让我对档案产生了纯粹的兴趣。每次打开一箱材料,你会有一种预感:一定会发现什么。当然,其实你不可能知道发现什么。你开始阅读这些文件,一封信接着一封信。渐渐地,某个人 的身影浮出水面,某个故事渐渐成形。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还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我把材料记在卡片上,放在鞋盒里。这是项艰苦的工作,但也很有趣,因为它让你有一种与那些被遗忘的人接触的感觉,而大多数人的生

---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BSS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大学教授”是哈佛大学的最高荣誉。达恩顿是哈佛大学在其荣休后仍终身保留办公室的两位教授之一。以下注释均为采访者所加。

②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③ 玛丽亚·露西娅·帕拉雷斯—伯克《新史学:自白与对话——九位当代最著名新史学家的访谈录》,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226页。

活其实都会被遗忘。

我之所以会对18世纪产生兴趣,与另外两位导师有关,他们是哈利·皮特和罗伯特·夏克尔顿(英国的孟德斯鸠研究专家)。我在他们的指导下,参与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研究项目: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这个研究项目深深吸引了我。回到哈佛大学以后,我的导师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历史学家)给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研究机会,成为哈佛大学学会(Harvard's Society of Fellows)的研究员(Junior Fellow):任职三年,只做研究,不做别的。我辞掉了《纽约时报》的工作,接受了这个职位,继续研究工作。

问:20世纪70年代以来,您一直从事书籍史研究。我们都熟知那个故事:您为了寻找雅克-皮埃尔·布里索(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吉伦特派领袖)的材料,而与纳沙泰尔的图书馆取得了联系,在那里,你发现了超过五万封通信。这是任何一名历史学家都梦寐以求的资料。我的问题是,在您刚起步时,书籍史研究的基本情况如何?

答:就结合我的经历来谈谈书籍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偶然事件有了越来越多的体会,我也会带着这些感触,回过头去看历史。很多偶然事件都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爆发了,然后世界经济就崩溃了。美国入侵伊拉克这样的事件会带来灾难性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个人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但是,按照年鉴学派的说法,历史本不该如此。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深入研究年鉴学派时,我吸收了他们的如下观点:将历史视为统计学所揭示的长期结构性变化。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称之为系列史学。1972年,孚雷向我介绍了与他合作的历史学家们在《书籍与社会》一书中的工作。他们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著名作家的名著上,而是用数据统计法分析百年来的趋势。启蒙运动的出现,隐含着从宗教到世俗主题的转变,这种转变发生在数十年间,规模巨大。年鉴学派的“书籍史”自认为有望揭示出文化的一般模式,一种能与年鉴学派学者们在研究经济史、人口史和社会史时发现的深刻趋势相媲美的模式。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项目,我认为自己为它作出了一些贡献。因为我从1965年起就在研究纳沙泰尔印刷公司(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以下缩写STN)的档案。当时,书籍史这个词还没出现,至少英文里没有,法语的说法histoire du livre或德语的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也还没有。事实上,在这个词出现之前,我就已经在无意中进行了书籍史的研究。当然,一些书目学家很早就研究图书,比如英国的麦肯齐(Donald McKenzie),但我们的方法不同。我的研究结果与孚雷等人相吻合,不过我研究的恰恰是他们的研究并不关注的文学作品:我可以统计非法书籍的数量,据此绘制地图,从而展现出它们在大革命前20年间在法国各地的传播情况。

20世纪70年代以来,书籍史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自己经历中的一个因素证实了偶然性的存在。我是为查一个脚注而跨进STN的档案馆,并不是为了研究书籍史,而是为了写一本雅克-皮埃尔·布里索的传记,他在纳沙泰尔出版了他的作品。当我放弃了传记,转而从事书籍史研究时,我选择了一条岔路,很快就没有了回头路。当然,其他因素也影响了我的决定。这并不完全是机缘巧合。

在回答你的问题时,我想提出一些我认为影响了许多史学工作者职业生涯的东西:不期而遇的机遇,接受或拒绝的选择,不可预知的后果,以及运气。我有幸在奖学金丰厚的20世纪50年代来到美国,在很容易找工作的60年代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事实上,我的运气真是好得不得了。不像我的父亲,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我从来没有参军。至于我作为一

个美国人为什么会法国感兴趣,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法国很有趣,不仅因为它本身(咖啡馆、葡萄园、大教堂),还因为它与一些基本问题有关。例如,观念如何在一种社会秩序中“起作用”?什么是公共舆论?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问:爱德华·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说,历史学和社会学互相学习,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您属于另一代学者,更提倡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您在普林斯顿大学供职时,曾与克里弗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一起主持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联合研讨会,长达20年。您还为格尔兹的新版《文化的解释》写了序。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觉得历史学有必要与人类学对话?

答:像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我在人类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中找到了灵感。我想指出一个对跨学科的误解。至少就我自己而言,我不觉得应该在社会科学中反复寻找工具。除了经济学和人口学之外,我不认为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被用来设计历史研究。在此,我想引用我所敬佩的历史学家的两句话来代替方法论式的建议。马克·布洛赫曾经指出,历史学家就像童话故事中的食人魔;他在嗅到人味的地方发现猎物。卡尔·休斯克曾经说过,人是一种制造意义的动物。

我认为,对意义的需求,对人类来说就像吃喝一样是最基本的。我不是说普通人会像哲学家一样思考问题。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证明的那样,人们在思想中将有形之物相结合,以此来表达思想和感情。人类学家想出了著名的例子,例如,玛丽·道格拉斯的穿山甲、<sup>①</sup>维克多·特纳的牛奶树、<sup>②</sup>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巫术—物质。<sup>③</sup>这些可助思考的事物被编织成仪式,并融入文化的一般模式,由此获得了力量。人类学可以帮助历史学家理解文化模式,但它并不能提供揭秘符号系统的工具。对符号系统的解释,与任何工具性或机械性的东西都无关,它是阐释的、是解释学的,也是诠释学的,但它并不武断。符号世界真的存在。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实。历史学家就像人类学家一样,可能会弄错它们,而且也可能没有把它们充分理解,就像我们不能用外语理解自己一样。在我和格尔兹教授的研讨会上,我们试图帮助学生们理解,对文化的解释需要严谨、证据和概念的清晰性。我们没有提供任何工具书,但我们的讨论仍然围绕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让其他时间和地点的人的生活具有意义。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认为,人际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戏剧性。<sup>④</sup>我们承担角色,并按照隐含的脚本行事。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从中获得的只是角色扮演概念,这想法在书中很明显。但在重读这本书时,我领会了一个更有争议性的想法:当我们扮演观众和演员的角色时,例如,在向服务员点餐或向官员登记领取驾照时,我们定义了一种情境,我们接受了一种对当下发生之事的共同理解。当我在阅读所谓的1787—1788年革命前的巴黎事件报道时,我发现当时的观察家们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倾向,那就是使用戏剧性的隐喻。例如,显贵会议被描述为“喜剧团”。随着信息的积累,我意识到,人们不断地提到角色表演,是在以某种方式构建事件,也就是戈夫曼所说的“定义情境”(defining the situation)或决定“正在发生什么”。按照巴黎人的理解,1787—1788年的基本情境是反专制的斗争。然而,历史学家的传统理解却是,革命前的革命是一场

① 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黄剑波等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道格拉斯在多本著作中分析过穿山甲崇拜。

②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③ 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覃俐俐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④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贵族起义。当时的人们与历史学家观点之间的差异,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事件,得以看清这些事件在集体意识的形成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就是我现在要写的这本书的主题。

问:您的研究对整个书籍史具有奠基性意义,否则人们就无法如此清晰地了解大部分法国人阅读或悄悄阅读的文学作品,它们包括了所谓的哲学书,或者用您的话来说,也包括“坏书”,即反对教权的作品或色情作品。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书籍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关系问题会如此重要?

答:这个问题很庞杂,我简单说说。其实,如果了解罗杰·夏蒂埃<sup>①</sup>等学者的研究,就不难理解书籍史的重要性。除了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之外,书籍史还与一些特殊问题相关。比如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或者观念起源,以及18世纪的法国人读了什么。这两个问题是有关联的,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启蒙运动一定与革命有关,但这还需要可靠的证据。法国学者丹尼尔·莫奈在1910年提出了这个问题:法国人在18世纪读了什么书?他是位优秀的学者,但在研究中犯了几个严重错误,结果这个问题悬而未决。我相信,我在《法国文学之旅》中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阅读了上千封书商之间的通信后,我全面统计了STN的订单,证明了市场上实际流通的是什么书。我也已经能够确定阅读人群的特征,当然是大致确定。书籍史可以带我们深入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世界,这是一种可以被称为思想社会史或民族学史的学术研究。

问:在书籍史的研究中,您关注的是书本身:书如何被制作、如何订购、如何销售,但是,您的研究似乎并不是很关心人们如何理解这些书,他们的理解对他们的行动有什么影响。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这和您的朋友夏蒂埃的阅读史研究有些不同。只要有材料,“读了什么”是一个能被证明的问题,但因为很难知道读者脑子里想的东西,我们很难进行阅读史的研究。您能不能谈谈在这些问题上您和夏蒂埃的分歧?

答:你说得对,夏蒂埃做的是阅读史,他更关心的不是阅读的内容,而是阅读的方式和阅读的影响。我当然同意书籍史应该包括阅读史,我曾在几篇文章中试图解读两个半世纪前法国人阅读书籍的方式。但是,这方面材料非常少,除了一些个案,我不可能发现18世纪的读者是如何阅读的。至于读者对其他作家的反映,我一无所获。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别的方面研究阅读,比如书籍旁注、摘抄、书评。但是,我不觉得我们有足够的材料来构建一部完整的、严谨的阅读史。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一些“概论”,比如默读在古代就存在,字距和标点符号的惯例是在中世纪出现的,这当然很重要,但不能与书籍史研究所得到的结论相提并论。夏蒂埃有很多精彩的看法,我很同意,但我认为他并没有创造出一部阅读史。

其他问题更棘手,比如怎么买书、如何形成观点,观点和行动之间的联系又是什么?我不相信线性的因果关系,所以书籍和革命这个问题依旧缠绕着我。但夏蒂埃的看法好像不是这样。他第一次提出他的看法,就是针对“书籍是否引发了法国大革命”这个问题,我记得是在法国广播电台“法国文化”的一次跨大西洋辩论中。我的总体看法至今没有改变,那就是不能把它想象成一条直线上的因果关系:从购买书籍到阅读书籍,再到读者心目中的同化(或挪用),再到作为一种集体现象的舆论,最后到行动。各种各样的复杂和扭曲都会在这条传播线上的许多节点出现。如果把它想象成一个线性的过程,很可能是一种误导。我的研究是经验主义的,这或许受到我读博士时英国风气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不知道法国革命前20年间法国人怎么读书、如何思考,但我们现在能知道他们读

<sup>①</sup> 罗杰·夏蒂埃《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洪庆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吴泓缈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了什么。

夏蒂埃开始时接受我的经验研究,但后来又否认了这些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尽管那些作品很流行,但当时人完全有可能对这些颠覆性的信息一笑了之。不过,他无法证明这一点,因为没有材料。18世纪的人对这些诽谤作品的阅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比如梅西耶和罗兰夫人的看法肯定不同。但是,他们都吸收了一些共同的信息,这些信息转化为对1787年和1788年事件的复杂反应。在那场革命前的危机中,我看到了一个被我称为“激进的简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会对他们的理解进行很简单的处理,划清界限,是反对国王还是支持国王,然后选择自己的阵营。当然,思想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认为,革命的情况涉及两极分化:界限被划定,舆论围绕着基本立场凝聚在一起,比如反对或支持当权者的人。对事件的看法变得和事件本身一样重要,当事件失去控制,整个系统陷入暴力时,这两者是无法分开的。这也是我在下一本新书中试图证明的。这个过程涉及很多偶然性,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或线性关系,这是我同夏蒂埃之间最大的区别。我倾向于证明那些能用材料证明的问题。

不过,夏蒂埃他们的工作也很重要。包括夏蒂埃在内,还有米歇尔·德·塞托<sup>①</sup>和理查德·霍加特<sup>②</sup>,这些学者的作品让我很受启发。他们强调了读者在构建文本中的积极作用,读者甚至会找到作者无意表达的意义。读者发挥着独立的作用,阅读也会随之改变。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读者的行为像偷猎者一样,从整体上看,这种偷猎可能看起来就像某种无政府状态,某种无休止地变化着的个人体验,而不可能呈现出一般的倾向。摆脱这种困境的一个办法,可能是倒退到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等文学理论家提出的“解释共同体”的概念上。但如何才能发现和描述这些共同体?它们的活动证据在哪里?和许多文学学者一样,我对作为理解文学史的一种方式的理论产生了戒心。

尽管有这些困难,但我认为忽视《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少年维特的烦恼》等几部重要著作的影响是错误的。卢梭的作品对法国的阅读大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1789年以后,这些作品对移民和革命者都有吸引力。在寻找应对困境的方法时,我最近被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塔尔德和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见解所打动。他们将阅读与集体意识的形成联系起来。尽管正如他们承认的那样,个人阅读书籍的方式不同,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读者都有一种参与同一集体活动的意识。安德森甚至将这种集体经验解释为殖民社会中民族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认为,旧制度时期的阅读大众,尽管是多样的,但可以说他们形成了一种参与文学文化的共同意识。18世纪是作家作为公众人物被歌颂的时代,是“作者的神圣化”开始盛行的时代,也是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类型首次出现的时代。这也是我希望写的另一本书的主题。

问:据我所知,您后来对更为普遍的交流史很感兴趣,还写了《华盛顿的假牙:非典型的18世纪指南》和《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您研究的不仅仅是印刷文本,还有口头材料和被传递的信息。您在这方面的兴趣是如何发展的呢?

答:这也很偶然,又是一次“偶然事件”。我在巴士底狱档案馆拆开一个箱子,发现了一份很厚的材料,标题为“十四人事件”。<sup>③</sup>原来,这是警方对1749—1750年巴黎街头流传的诗歌和歌曲的调查。

① 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第1卷,方琳琳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③ 《诗歌与警察》法译本的标题就是《十四人事件:诗歌、警察与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

通过跟随警察追踪演说家和歌唱家的踪迹,我们可以重建口头交流网络,看到声音、文字和印刷品在交流系统中的交集。要解释这些材料,甚至把它作为一个主体来感知,关键是要对传播理论有一定的熟悉度。我在18世纪40年代街头歌手的手稿中发现了上百首关于时事的即兴歌曲后,接触到对歌曲进行音乐注释的手稿。我的朋友艾琳娜(Hélène Delavault),是巴黎一流的歌舞团歌手,同意演唱这些歌曲。在我的一篇文章的电子版中能听到这两首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历史歌唱。

问:与您之前从事的书籍史相比,交流史会在理解、解释历史方面有什么突破?

答:阅读与集体意识之间的联系,会影响我们理解启蒙运动与革命关系的尝试。例如,伏尔泰在卡拉斯事件中动员了公众,使他们愤恨教会和司法部门的滥用权力。他并不像他早期所做的那样简单地嘲讽宗教正统,而是通过占领道德高地来破坏教士和高等法院法官的权威。正是这种道德权威的转变,而不仅仅是对已有道德权威的侵蚀,使启蒙运动成为一种力量。革命者们被这种转变、这种道德能量所驱动,开始着手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乌托邦热潮可以像野火一样在社会秩序中蔓延,特别是在宗教改革时期,我认为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中。巴黎各区的平民百姓被激进主义者的能量和幻象所吸引,这些人下层文人和法律人士,在艰辛的职业生涯中吸收了启蒙观念。正如我在《圣水中的魔鬼》一书中试图表明的那样,革命时期的激进派人士皮埃尔·曼努埃尔就是这种类型的街区激进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得益于新闻界的力量,同类人物如布里索、卡拉、马拉、丹东、德穆兰,掌握了国家权力。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论点,将激进主义与格拉布街(Grub Street)这一环境相提并论时,我的说法过于夸张了。但我并不是要把革命的能量简化为雇佣文人的挫败感。相反,我想证明在意识形态动员的过程中,这些模糊的中间人的重要性。

在这个过程中,非印刷媒介是至关重要的。无套裤汉即使识字也很少读书。他们听演讲、唱歌、参加游行,吃饭时盘子周围装饰着弗里吉亚无边帽和打鸣的公鸡。报纸和小册子汇入了一股席卷巴黎的声音和图像的暗流。1789年之前,这样的暗流始终存在于巴黎。在《诗歌与警察》一书中,我试图在1749—1750年政治危机的背景下重建此种暗流的流向,当时莫勒帕政府被推翻,同时代的人将其衰落归咎于“歌曲”。这一观点是对当时所有媒体传递的混合信息的简短描述,而这些信息实际上决定了事件的发展。所以,我确实认为,书籍史应该以对其他媒介的研究,以及普遍意义上的交流史研究作为背景。

问:法国学者安托万·里尔蒂在2014年的一部文集《剑桥指南:法国启蒙运动》中提出,是否有可能书写启蒙运动的社会史?我们不能否认,漫长的启蒙运动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知识与思想图景带来了深远的改变。早先的研究者往往关注那些启蒙思想家和他们的代表作,比如刚译成中文的盖伊的《启蒙运动:一种解释》。这种取向现在还有,比如前几年伊斯瑞尔(Jonathan Israel)的多卷本的启蒙研究。您在《前革命时代法国的上层启蒙运动与底层文学》这篇文章中,则号召“眼光向下”。这篇论文具有标志性意义,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您觉得总体上我们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启蒙运动的了解有哪些进步?

答:里尔蒂通过《沙龙的世界:18世纪巴黎的社交性与名利场》这本书,部分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他的两本书都成功地将启蒙运动与18世纪巴黎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不过,它们并没有构成一部启蒙运动的社会史,这是一项需要更广泛研究的事业。当然,一个问题是如何构思启蒙运动本身。我不太相信定义,因为它们往往会把一个主题具象化,也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事物本

身,一旦确定了它就可以像追随血液中的放射性物质一样在历史中追随它。里尔蒂意识到这种危险,因此他研究哲学家在沙龙中的活动时,也强调了其中的游戏和世俗娱乐。他把卢梭的影响放在社会背景中,展示了这种影响是如何随着一种新的现象即迷恋名人的浪潮而被带入社会。我们对启蒙运动的社会背景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把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理解。以社会视角考察启蒙运动,我们可能会模糊了哲学家的思想锋芒,低估了他们的前沿性。

这个问题对二战后立即为启蒙运动确立研究方向的那一代人来说,似乎并不迫切。虽然我自己并不打算成为启蒙运动历史学家,但通过我在牛津大学的导师、研究孟德斯鸠的专家夏克尔顿,我认识了这一代的主要学者。他介绍我认识了意大利专攻18世纪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弗兰科·文图里。后来我与罗兰·莫迪埃成为挚友,并结识了其他专家如雷内·波莫、拉尔夫·利、艾拉·韦德等人。虽然他们在对启蒙运动某些方面的描述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并不觉得启蒙运动本身有问题。运动的领袖可以被识别,运动的思想可以被分析。它是一个研究领域,有自己的学术评论、组织和大会。根据他们的理解,启蒙运动挑战了正统思想。它以教会为主要攻击对象,推动了各种社会和政治改革。

我一开始就是“自下而上”地研究启蒙运动。因为我的资料涉及的都是“一般作家”,可以说是“平庸作家”。他们的观点很可能和哲人们有冲突,但他们人数很多。所以,人们很容易感觉,我的研究好像在质疑启蒙运动的存在。在之前伏尔泰基金会出版的《达恩顿之争》中,有些学者就表达了这些疑惑,甚至是质疑。实际上,我试图阐述的是作家的社会学,我从未想要重新解释启蒙运动。我只是想考察那些启蒙观念到底如何在社会中“生根”。所以,我会考察范围更大的群体,针对18世纪文艺界的社会构成,还有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开展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格拉布街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伏尔泰本人也操纵了他那个时代的媒体。他是一个支配舆论的高手。但是,如果没有他激励和动员的那些人士,他就不可能成功。通过研究他们的活动,人们可以看到启蒙运动如何深入社会结构。这就是我试图建立的启蒙运动研究的方向,即走向所谓的“思想的社会史”。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观念史,这既是学术关怀,同时也是生活经历的反映。对二战前的那一代学者来说,启蒙运动给了他们希望,相比之下,他们更关注伟大人物的思想。

问:我们再来谈谈全球化和数字化的问题。几乎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化,谈论数字化和大数据。您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答:试图在全球视角下看待一切的尝试可能像是一时风尚,但这其实适当地回应了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现状。西奥多·贝斯特曼创立国际18世纪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ighteenth - Century Studies)时,这个组织主要致力于研究著名哲学家,首先是伏尔泰。现在,全球有37个国家建立了18世纪研究会。研究会的成员希望调查启蒙思想对世界各地人们的影响,他们想知道其他地区的人如何形成自己的相关思想。

启蒙时期的学者们研究了书信网络,展示了知识分子如何通过邮件进行交流,以及他们的交流如何创造出一种共同的参与感。举个例子,当时柏林科学院(Berlin Academy of Sciences)秘书塞缪尔·福美(Samuel Formey)的书信往来让人震惊。他几乎每天都会与西方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有几十封通信。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话题即数字化。如果将福美的书信数字化,那将是一幅文人交流的地图。我们现在有了伏尔泰、卢梭、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书信近乎完整的版本,而且它们已经数字化了。它们与

其他许多作家的数字版著作一同储存在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中,即由牛津大学管理的电子启蒙运动(Electronic Enlightenment)。另外,狄德罗百科全书等文本的数字化,为词汇搜索、语境考察和话语分析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尽管我是研究纸质图书的,但是也一直在尝试电子化。在担任历史协会主席时,我就在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申请了一笔资金,推动了一个电子化项目:Gutenberg-e。当时是为了解决两个主要问题:建立一种新的学术著作的模式,一种可以在网上查阅的新型学术著作,以及最近的博士生在出版专著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后来证明这个项目很成功。在担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后,我与一些计算机科学家联手,开启了一个开放存储运动:DASH。因为我相信图书馆的资源应该被用于公益事业,通过数字化的方式与世人共享。我们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计划将美国所有研究型图书馆的所有数字馆藏整合到一个系统中,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免费使用。这个项目从2010年启动,到2013年4月18日,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简称DPLA)建成了,涵盖了美国50个州,4300个机构的图书资源,书籍总数超过3500万册。

我自己的工作包括尝试制作一部关于18世纪法国和瑞士的出版与图书贸易的大型电子书。它将包括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影像资料,读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使用它。我希望可以把它作为一种传统的叙事方式来阅读,即横向阅读。但是,读者也可以纵向阅读,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通过连续的小册子和数据层点击向下阅读。这样一来,读者就可以在材料中创造出自己的个人路径。得益于印刷业的技术进步,他们将能够在几分钟内打印并装订出自己的平装书,在舒适的扶手椅上或以任何他们喜欢的方式阅读。这样的书将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一种赋予读者权力的阅读,使读者成为作者的合作伙伴和批评者,为扩大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开辟了无限的可能。电子化和数字化有价值吗?有的。它能解决一切问题吗?不能。我们的工作证明了这种尝试可行而且也符合知识的民主化趋势,但这毕竟无法取代传统媒介。我想读者也会以传统的方式享受传统图书的乐趣。

我想在最后提出一个未来学术研究的可能方向。启蒙运动可以理解为一场传播光明的运动,其大部分思想在18世纪之前就已经形成。赋予“启蒙运动时代”以特殊性的是思想的传播以及随后的付诸实践。伏尔泰、富兰克林和福美这样的领袖们有意识地操纵着当时的媒体。我们可以研究和比较他们的策略,由此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即他们如何拉拢盟友、攻击敌人、助力改革、改变舆论。这类研究已经在进行,其成果可能会接近于启蒙运动的社会史。如果让我选一本书来举例说明,我会举出已故的雷蒙德·伯恩的《锻造卢梭》。这本书对卢梭嵌入法国人的共同想象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精湛阐述。

(作者张弛,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成沅一,浙江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邮编:310058)

(责任编辑:董欣洁)

(责任校对:张舰戈)